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和现实选择

史守林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

当前,正确认识和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战略定位,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把握发展主动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国内大循环,是加快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实现经济循环的重要议题。

这不是被迫之举和权宜之计,而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重心将逐步从重视经济规模的“高速增长”转到提高效率和质量上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发展主题。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党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和实践运用,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我们要以此为着力点,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不是搞地区小循环,而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国内大循环。我国国内循环是建

立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而不是每个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环,必须有效破除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然而,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竞争。坚决破除地区间各自为政、“诸侯割据”的错误认识,引导各地区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打通“区块”“省域”和“城市”“城乡”等不同区域空间之间的经济循环,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之一,正是得益于内外需市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良性互通,中国经济才得以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要通过发挥内需潜力,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满足国内需求、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的同时,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为我们明确了工作重点和方向、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遭遇过很多外部风险冲击,最终都能化险为夷,靠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进一步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堵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确保我国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行稳致远。

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

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以巩固既有改革成果为前提,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

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基础研究要勇于探索、突出原创,拓展认识自然的边界,开辟新的认知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立足本国优势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好动力问题,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我们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加快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作者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发挥好高校基础设施的文化承载功能

汪长明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尤其是“双一流”建设工程的启动,文化传承与创新进入高等教育的主体功能范畴,文化建设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用不断增强。如何不断激活、合理挖掘并充分利用高校在长期办学历程中积聚的文化资源,通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增强广大师生的文化自信,凝聚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合力,助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是摆在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份现实答卷。

坚持历史内涵与时代特征统一。道路、楼宇、场馆、纪念设施、景观等是一个地理单位最基本的空间网络“骨架”,既具有物质层面的视觉传达、空间识别功能,也具有精神层面的意象表达、价值引领功能,而且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内涵和意象空间,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价值与符号承载。对高校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集教育功能、文化支撑、价值承载等于一体的一种精神符号。

就功能发挥与拓展而言,校园基础设施应随着学校的发展而不断优化,在融合历史底蕴与时代潮流的基础上发挥、拓展自身功能,服务于学校的文化育人实践。在高校,尤其是具有较长办学历史的高校,为保持办学传统的连贯性与文化传承的一致性,校园内的很多基础设施实际上在历史上“古已有之”,与学校发展历程一脉相承,是研究学校发展史的“活化石”。高校很多道路与校园历史景观相互呼应,成为学校文化展示的亮丽名片和文化育人的无声教材。就部分历史底蕴深厚的高校而言,对校园基础设施一方面要保护好固有历史元素,另一方面要进行美化,可进行综合设计(包括兴建基于实际需要且风格匹配的楼宇、绿化带、塑像等)以增加现代气息,使其具有“文化美感”,不失为使校园基础设施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统一的科学做法。

坚持大学精神与办学特色统一。大学应具有服务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使命和担当。在高等教育漫长发展历程中,一代代大学人凝聚并形成了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文明成果。大学精神是科学精神在大学这一特定场域的具体凝聚,是一所大学的鲜明标识。

大学精神与办学特色是大学的“一体两面”。校园基础设施是传承大学精神、彰显大学办学特色的重要物质载体。以既体现大学精神又彰显办学特色的“关键词”(如校训、杰出校友、重大历史事件)冠名校园楼宇、雕塑、道路、景观等,成为大学精神代代相传、办学特色生生不息的重要“符号动力”。这些具有大学自身特色的“文化词汇”与实体形态基础设施相结合,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面向广大师生开展校情校史、理想信念、思想政治教育,塑造其对学校文化传统、办学成就与特色等的认同感,有着潜移默化的浸润作用。

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科学精神表现为崇尚科学、追求真理,严谨笃学、开拓进取,孜孜不倦、勇于奉献等,可以为受教育者理想信念的塑造、道德情操的培养提供不竭的动力,更好地激励人才的成长,从而实现科学的传承与创新。人文精神表现为报国为民、无私奉献等,人既是大学的教育主体,也是大学的培养目标,因而在这些观念和思想中,人文精神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大学文化价值的核心。

高校在对校园基础设施进行总体布局时,要充分考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让寓科学与艺术于一体的基础设施成为承载大学精神的标签和名片。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于基础设施的文化功能承载上,有利于推进科学知识普及教育、科学精神弘扬传播和科技创新基础教育,更好地激励人才的培育和成长。

让非遗更广泛地融入现代生活

袁文良

近日,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公布项目325项,涉及465个申报地区或单位,一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项目列入了名录予以保护。至此,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有1557项,共涉及3610个申报地区或单位。

人类在悠久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大量值得珍藏的文化财富,其中之一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与那些固定成型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人类世代相传、口传心授、活态的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不可重复的历史遗存和文化记忆。

近年来,许多非遗项目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融入现代生活,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出了积极贡献。不过,非遗作为一种活态文化,是直接依靠人、作用于人的活态传承。所以,要让非遗成为时尚新宠,还有待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针对当地非遗项目的类别与特点,在加强名录建设、提升管理层次、保护传承技术等方面下功夫,让非遗更广泛地融入大众的现代生活,从而使传统技艺迸发出时尚的火花,散发出时尚的味道。

一是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当地文化发展建设纲要,并适时制定出台有关非遗传承保护的法律法规,明确有关部门的责任与义务,促使各级各部门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同时对那些误解、歪曲和滥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或因保护不力、过度商业开发等原因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消亡、变调的,不论涉及什么单位什么人,都要严厉问责,绝不能姑息迁就,更不能下不为例。

二是要组织专家对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全面摸排,建立明细台账,并根据其项目的自身特点科学分类,在追求最合理资源配置、最有效文化传承、最大化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互联网+”相结合、与文化创意相结合、与文化旅游相结合,促进生产性保护措施的落实,并将产品不断推向市场,以充分发挥非遗作为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进而让那些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非遗项目在生产实践中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三是要想方设法挖掘和培养非遗传承人,为他们在非遗的传承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创造优良的学习条件,提供有效的后勤保障,以不断提高他们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创新能力,从而开发出具有时代元素的非遗产品。同时要依托互联网技术,积极为具有时代特色的非遗产品打造网上销售平台,并通过市场“倒逼”非遗传承人改变思路,与时俱进,进而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推动非遗的继承、创新和转化,提升产品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持久战

郭子源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对于在金融系统中占据主体地位的银行业来说,不论当前还是今后,都必须毫不松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银行业风险化解工作已取得一系列进展,高风险金融机构和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序处置。例如,依法、稳妥推进包商银行等高风险中小银行的风险处置;2017年至2020年处置的不良贷款超过之前12年的总和;有序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房地产贷款增速8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全部归零等。

尽管诸多存量风险已“水落石出”,但增量风险仍不容忽视,必须做到居安思危,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持久战。银行业要以自我革命的方式防止发生金融危机,尤其是金融管理者,要通过刮骨疗毒、精准拆弹的方式及时清除风险隐患,让监管“跑在系统性风险的前面”。

具体来看,一是要健全金融风险的预防预警体系。其中,要坚持不懈地治理金融市场乱象,坚决防止影子银行反弹回潮。二是要建立权威高效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风险外溢性不强的高风险机构尽可能有序退出。三是要强化金融风险问责机制,压实股东、各类债权人、地方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的责任,对其相关责任进行严格的追究和惩戒。

减负在行动



祛除“指尖”之苦,才能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与活力。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下,各地各部门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取得了良好成效。新华社发 王鹏作

实现“十四五”规划要重视跨界治理的作用

李媛媛

跨界治理主要是指跨区域、跨部门、跨级别、跨公私领域的治理。目前中国跨界治理的基本实践所涉及场景包括:一是跨行政区划的治理。二是跨界别的治理。三是跨部门治理。四是跨级别治理。总之,跨界治理不仅包括不同地区之间,也包括治理空间中政治上的横向纵向、也包括国家—社会—市场这一体系。

改革开放40年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国家对各地区、各部门、各层级、公私各个领域有利的改革已基本完成,分头改革的红利已经基本释放完,下一阶段要做的就是继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去分蛋糕。而跨界治理就是将这些已经壮大了的各个“原子”和“孤岛”连接起来,将各界别的“断头路”连起来,建立起合理分配蛋糕方案的一个过程。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笔者认为在未来要深化改革和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提高跨界治理能力极其重要,主要原因如下:

一、提高跨界治理能力可以促进全面深化改革。从理论上讲,跨界治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作用和它本身自带的“改革”意义。2018年的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改进了我们的四梁八柱,使我们国家的“房体结构”得到优化,而下一阶段就是建立起各个机构之间的良性合作体制机制。同时,“调动起各方积极性”,盘活各个要素,让要素与要素、部分与部分之间可以高效合作,释放出最大效益,更大程度挖掘现有要素的潜能。

二、提高跨界治理能力可以加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要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潜力,除了发展科技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挖掘人力资源能力、传统的加大资金投入等,我们需要发挥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而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遗憾的是,现实中我国跨界治理方面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缺少相关的元制度。党和国家的规范性文件中缺少有关跨界治理制度,目前我们的治理体系中党、政、军、群等相关制度都有其规范性文件,特别是有关“政”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一国两制、外交等制度都有明确的条文,但涉及调整润滑关系等的元制度的很少(单一制算一种,公司法里涉及混合所有制制的一种)或直接缺失(跨部门如何合作、跨地区如何合作几乎没有,仅有一些更具体的法规如区域一体化规划发展纲要)及跨界治理的法律法规分散不一且质量参差不齐,尚未得到很好的整合。

二、跨界治理牵头机构不统一、体制有待完善。目前的跨界治理机构没有统一的规定,以跨区域治理为例,有的地区成立由更高级别政府牵头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如京津冀。有的地区成立跨区域松散联盟,如淮海经济区的协同发展座谈会,由参会的主要城市牵头。不同于官僚制下完善的机构、人员设置、跨界治理机构架构、编制设置、资金保障,规章制度都处于极其不完善的状态。

三、跨界治理机制有待完善和提纯。以跨区域治理为例,目前的跨界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分类别的交流交换如公务员、教师的交流机制,涉及个别医院的异地医疗统一结

算机制;分过程的政策法律制定机制、联合执法机制等。目前的问题是跨界治理机制未能做到领域全覆盖、流程全覆盖,且合作程度低不够深入。另一个比较显著的问题是跨界治理核心机制的缺失:一些地方有自己的地方利益但囿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或自身利益又都隐藏想法,这是合理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前提,即缺少真实利益显示机制;此外,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作为跨界治理良好运作的核心机制,它的缺位或不合理进一步限制了合作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四、跨界治理有效能评价缺少相关的标准。有关跨界治理效能目前更多的一些是民间智库或者官方智库会做一些评估,但一方面目前这些评估对公职人员的绩效评价影响不大,另一方面目前评估标准参差不齐,各有各的标准,缺少一个权威的、国家层面的评估准则和指标体系。

五、跨界治理领域亟须思想解放。那么如何去提升跨界治理能力呢?在笔者看来,未来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补充有关跨界治理的元制度。首先,补充有关跨界治理相关的元制度,规定处理有关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治理、公私合作治理的原则和规则,为跨界治理指明方向,制定冲突利益处理规则;其次,整合现有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并尽快查漏补缺,补足跨界治理元制度短板。

二、提高跨界治理牵头机构地位,完善跨界治理体制。首先,各层级政府要梳理跨政府部门、跨区域、跨界别等的跨界治理机构,一定程度上提高其机构的地位,为跨界治理提供机构保障。其次,各跨界治理机构

要进一步梳理并完善其组织架构、完善法律法规和相关流程。再次,国家要对有关跨界治理人员编制、资金等给予保障,对人员晋升机制予以规定。

三、完善和优化跨界治理机制。跨界治理机制涉及的问题一般都比较具体,国家层面仅需对其进行原则上的规定和建议即可,具体机制更多需要地方政府在实践中予以细化和创新完善,完善和细化协同治理机制、跨界联动机制、协调规划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府际纠纷解决机制等。要加强跨界治理的应用范围,除了产业优化配置、交通一体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跨界合作,应继续扩大跨界融合,加大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合作。

四、制定有关跨界治理评价标准。首先,要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价在推动跨界治理中的作用,引导专家和智库机构参与到跨界治理的政策评价以及执行评价中来,为跨界治理提供专业支持。其次,国家要在当前试点的如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经验的基础上制定跨界治理的评价标准,细化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和评价过程,为全国跨界治理评价提供参考。再次,国家要细化有关公职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将有关跨界治理效果与晋升结合起来。

五、大范围宣传跨界治理的意义,解放思想。政府要对跨界治理的相关官员进行培训,引导他们解放思想,打破狭隘的认为跨界治理是零和博弈的观念,同时培养官员的大局观念,培养官员合理利用社会、市场力量解决跨界治理问题的技能。社会媒体也应向公众宣传更多的跨界治理的意义、典型案例等,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舆论氛围。(作者系中央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博士生)